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启功讲学录

启 功 著
赵仁珪 万光治 张廷银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启功讲学录

启 功 著

赵仁珪 万光治 张廷银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功讲学录 / 启功著; 赵仁珪等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文库)

ISBN 7-303-07410-4

I. 启… II. ①启…②赵…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811 号

责任编辑: 侯 刚

整体设计: 翁 涌

责任印制: 董文权 李 博

启功讲学录

Qi Gong Jiangxuelu

启功 著 赵仁珪等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编: 10087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7-303-07410-4

定价: 13.0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编者前言

赵仁珪

启功先生有很多名头，但他说自己的本职是教师。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起，他从教已71年，今年他已92岁高龄，仍不顾体弱多病坚持亲自指导十余名博士生。可以说仅从所付出的心血和工作量来看，他确实不负这一本职称号。但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从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他教授的主要是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直到解放、院系调整后，他仍是以教授作品选为主。因为那时有明确的规定，像他这样家庭出身不好、本身又不是“左派”的人，是不能担任文学史史论课程的，因为这些课程涉及到唯物史论和唯心史论大是大非的问题，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讲。众所周知，启先生是一个大杂家，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诗词理论、经学、小学、语言学、版本目录学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就是恩准他去讲文学史，也未必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更何况只让他讲几篇古文呢？所以他从教的时间虽然很长，但前二十年真正能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反右”之后，他连上讲坛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而“文革”中斯文扫地，被剥夺权利的又何止先生一人。于是中间二十年荒废殆尽，根本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真正能在这个本职岗位上展示才能的只有这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他先后招收多届硕士生、博士生，给他们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不但有了上讲坛的权力，而且不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可以自主选择最适宜、最擅长的课程。于是他先后开设了以唐代文学、明清诗文为主的文学史课；以汉代、宋代、清代为主的历代学术思想史课；以文化常识和文献常识为主的古籍整理基础课；以及其他一些课程。这些就构成了这部书的四部分：第一编：论文学；第二编：论学术思想；第三编：论古籍整理；第四编：其他。

在这些讲授中，启先生总算找到阐发自己学术观点的机会，也确实讲出了很多精辟的观点，笔者早想把它们整理出来与广大读者分享。所幸的是，我们或得益于有心的学生，在技术条件还不够发达普及的条件下，能够靠详细的笔记，把先生所讲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第一编就是万光治先生根据当年的笔记整理的；或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如第二、三、四编就是根据当年的录音资料，主要由张廷银先生整理的，于翠玲、朱玉麒、张斌荣等先生也参与了整理工作。全书由赵仁珪负责统筹编辑。所不幸的，一是这部书仅收录了近二十多年的讲课、讲学内容，以前的四十年虽不能随心所欲，但终有许多精彩的内容，因尚未搜集到较为详细、系统的记录而未能收进；二是仅就近二十多年来看，仍有许多遗漏，有些很重要的讲学内容因种种原因未能记录下来，这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而更大的遗憾是，先生本可按这些讲学的思路自己写成专著，笔者就多次听到先生发愿要写一部学术思想史和一部古籍整理基础知识的专著，但这二十多年先生实在是太忙了，身不由己，能抽出一些时间写出一些相关的单篇论文已很不容易了。最近眼疾加剧，更难以亲手操觚，不得已，只能先奉献大家这样一些简略的提纲和片段的论述。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向大家推荐这部书。它虽然不是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既有讲文学的，也有论学术思想的，还有谈古籍整理的；在每一部分中，既有宏观的总体概括，也有具体的分析释例；尤其可贵的是能拉通各代，能从史的角度观照历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变化，如在论学术思想时，从初民文化谈起，一直谈到汉学、宋学、清代的今古文经学，充分体现了启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总体观照。启先生在教学中最反对机械死板地分科分段，提倡通识、通才教育。如何才叫通识、通才？如何才能通识、通才？这本《讲学录》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与示范，这一意义已超出他所讲的具体内容之外了。在具体讲授之中，这本书也很好体现了启先生的风格，生动、有趣、充满智慧。它虽然仅是一部笔记，不可能有更多、更详尽的论述，但这决不影响它有很多、很新颖的见解，我们能不时地从中发现很多很有趣、很富于启发性的观点，顺着这些思路思考下去，我们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得出更深刻、更新鲜、更全面的认识。这部

《讲学录》如能达到这一目的，也就足够了。作为一部《讲学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因为是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的手段、经不同人整理的，所以最后呈现出的文字风格各有不同；因为是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听众所讲的，所以有些内容难免有交叉；又因整理者条件、水平有限，有些记录可能不够明晰，甚至会有错误，对此整理者应负责任。对于出现的错误，我们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对于出现的其它情况，我们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谅解。

赵仁珪

2004. 6. 20

目 录

编者前言	赵仁珪 /1
第一编 论文学	万光治整理 /1
第二编 论学术思想	张廷银整理 /71
第三编 论古籍整理	张廷银整理 /107
第四编 其他	张廷银、朱玉麒、赵仁珪等整理 /149

第一编 论文学

万光治笔录并整理

整理者序

昔愚以“待罪”之身，混迹大学。复因舞文弄墨，任意臧否，一年甫满，即被扫地出门。自后戴盆望天，画地为牢，十载有四。1978年，研究生招生恢复，愚有幸忝列先生门墙，恭聆教诲。其时，“四害”既除，天地回暖。一朝入名校，从名师，其欢喜踊跃，不言可知。其时，弟子九人中，愚学历最浅，且非中文出身。所幸先生讲课，举重若轻；幽默风趣，启人心智。愚坐沐春风，神游万仞。奋笔疾书，恨非有文必录；每有会意，欣然不能自己。课间小憩，先生墨宝，著于黑板。弟子肃立仰瞻，当值不忍遽去。至今诸生，犹忆当时情状，以为美谈。一年之后，所录笔记，居然成册，朝伴夕随，不忍释手。毕业辞别先生，回乡任教，恍惚之间，二十一年过矣。每每翻检旧篋，细味笔录，先生当年风范，依然目前！

昔先生壮盛之时，蒙冤抱屈；“班联右序”，无言著述。“脱帽”之后，一身轻松，不意复为书画所累。愚偶赴京门，谒见先生，每见捷足者比肩立于室，迟到者络绎候乎庭，以致门铃继响，不择晨昏。兼之先生秉性随和，待人宽厚，凡有所求，不忍斥拒，遂使书家之名，掩其学者之实；著述之于先生，又成奢侈。虽然如此，先生《韵》《絮》二语，前唱而后续；《绝句》三论，珠联而璧合；举例明诗文之格律，著文析汉语之现象；序跋以考文物，叙论以辨文章。故诗人之誉，日渐其明；学者之质，日见乎彰。先生每有新著，不忘弟子。愚抚简闻香，又如亲炙于帐下；掩卷而思，复生遗珠之憾恨，何哉？先生昔日之高论，临堂之发挥，皆言犹在耳，今未必尽在楮墨之中。愚乃不辞谫陋，整理昔年笔录，务求原貌，以飨后来学子。先生知我心事，当不以我为冒昧。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四日

光治谨识于四川师范大学

[编者按]

此编共十五讲，大致可分为四部分内容：一、唐代文学(一~六讲)，二、八股与诗词常识(七、八讲)，三、明清诗文(九、十一、十二、十五讲)，四、书目答问(十、十三、十四讲)。可以看出当时讲解的顺序有时是随堂安排的，分割得并不特别严格。为了更好地保留讲学时的原貌，我们仍以启先生当时讲课的时间排序(每讲的标题都有具体的年月日记录)，不再做前后顺序的调整，这一点请读者谅解。

一、1979年4月5日启功先生讲唐代文学

怎样去研究唐代文学？谈谈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1. 文学史为照顾全面，考虑不同程度的人阅读，故颇受局限。我认为文学史不可不读，亦不可太读。全面的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如《唐诗三百首》，所选李白诗都是精华。但如读《李太白全集》，却发现有许多糟糕的诗。所以，了解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时代，除文学史外，其余大有可为。

2. 要居高临下，不能被作品吓住，更不能为当代人的议论吓住。要看一个作家与前者有何关系，在当时有何作用，对后世有何影响。“有比较才有鉴别”。研究唐诗，不研究六朝诗、宋元诗，则无法比较。如初唐四杰，有人认为不如盛唐，但对比六朝，则可知何以在当时有如此大的影响。

3. 背景与文学艺术成就关联极大，但关系究竟怎样？有些背景是当时生效，有些是经酝酿以后生效的，应该予以注意。现今有些文学史将作品和背景的关系处理得不好。背景对文学，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4. 背景与题材。题材是当时的，它借助一定的艺术手法表现自己。但题材的酝酿非一夕而成。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可称作“诗史”，但他所以能如此，亦非一夕之功。这当中不仅有他自己的努力，也得之于汉魏六朝、初唐、盛唐文学之力。正如长期施肥，一朝沐浴阳光雨露，新芽便可破土。故杜甫的成就，除安史之乱的背景，还有另一方面的条件。

5.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风格、面目，但其间不能一刀切断。如唐分四期，明、清便有人议论，问一个作家历经两个时期，该如何分？唐分初、盛、中、晚，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盛衰没落，虽然与文学有关，但并不绝对。如盛唐文学则并非唐文学的高峰。

所以，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个动乱的社会，作品易于及时反映现实，升平时期则不一样，故有“诗穷而后工”之说。“蜀道难”好写，“大平原”则不好写。李、杜写安史之乱，以已有的写作才能，如鱼

得水，故有成就。初唐人的文化教养是隋统一的功劳。唐建国以后，这些人的创作才能已经成熟。其实隋文学已较成熟，初唐是隋酝酿而来的。中唐韩愈、白居易等，颇得盛唐之力。白居易的诗如糖水经过沉淀，毫无渣滓。韩愈诗并不在李、杜之下。人一说韩愈，似乎只有古文运动。其实在安史之乱后，他的诗极有价值，如《石鼓歌》。可以说，韩诗中某些篇章长于他的文。此是个人看法。

韩愈气魄大，飞扬跋扈；白居易则婆婆妈妈。白作诗并未征求过老妪的意见，这是后人的误解。元、白诗相比，元是一锅粥，白诗如过滤沉淀后的糖水。北方曲艺行话有“皮儿厚皮儿薄”之说。皮儿薄者，一听就懂；反之则皮儿厚。元、白诗正有皮儿厚皮儿薄之分。

繁荣昌盛的局面短期难以反映入文艺作品。杜诗中表达快乐的欢娱之辞仅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馀皆愁苦之辞。故唐的分期，文学与政治难以平衡。

传统的文学批评鄙视唐代中期、晚期，我认为不妥。晚唐诗风细腻，如赵嘏、许浑、司空图，诗的精密度很高，这正是安史之乱再度统一后施肥浇水开出的花。正如二茬茶较第一茬长势弱一点，其味并不弱于前者。

我曾有笔记一条：“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唐人“嚷”诗，出于无心，实大声宏，肆无忌惮。宋人诗多抽象说理，经过了熟虑深思，富于启发力。当然，以上几句不可理解得太绝对。

唐代四期，诗风也有以上四句话的特点。

赵嘏诗：“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最后三字平仄为：

| — | — | —

唐人擅长律句。到了晚唐，诗人赋于此道，故赵嘏于诗中常熟练地运用拗句。

许浑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后三字平仄为：

| — | — | —

他们的律诗里几乎都有这种拗句，这说明晚唐诗人作诗都经过一番熟虑深思。从中也可看出他们作诗，是何等细腻。

司空图的《诗品》虽曰文艺批评，其实是借此创作二十四首四言诗。

说宋人逻辑思维多，其实晚唐已有萌芽。

宋以后诗以摹拟为主，闹了不少的笑话。汉乐府有《鼓吹铙歌》，其中“衣乌鲁支邪”，本是衬字。但明人前后七子模拟《铙歌》，连这几个字也要模仿，难怪要被钱谦益臭骂一通。

关于唐代文学，讲四个问题。

一、骈体文在汉魏六朝即很盛行，但不定型。汉赋如汪洋大海，语言规格(指格调)仍过分堆砌、大块。后来的抒情小调更澄澈灵巧。唐人的骈体文更成熟，从场面声势到阐发道理，都运用自如。四六体及律赋都定型成熟。《文苑英华》收有大量的唐赋，主题、题材及手法都很丰富。

皇帝为什么喜欢《文苑英华》？他们不一定都能读懂。骈体文何以在唐代很盛行，穷工竭力，争妍斗胜？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六朝以来，散体文曰“笔”，骈体文曰“文”。文者，图案也。推衍之，文当有规整，有装饰。实用品加装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文章亦如此。实用之外，应有装饰。但“踵事增华”，最后越堆砌越多，便走向极端。骈体文何以发展成四六文？今人有标点，古人则无。汉人之句逗用“乚”。汉墓文书无句逗，极少用“乚”。骈体文令人一读，可自然找出停顿。骈体文抒情、写景、咏物有其优越性，除表达意思外，还极具美感，也便于阅读。所以骈体文皇帝也喜欢。

宋代官僚用品字笺(亦称“品字封”)，十分累赘。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尤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绍兴初，赵相与元镇贵重，时方多故，人恐其不暇尽观双书，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直叙所请而并上之，谓之品字封。”即宋代上呈文时，以骈俪体为正文，另附手书小简，叫双书，后又附单纸直述所请内容，三者合成一封，叫“品字封”。

“笔”，散体文；“文”，骈体文。“文”堆砌愈多，生气愈少。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以“笔”救“文”，故“笔”兴盛起来。“五

四”以来，一般人用“笔”写文章，用“语体”写书简。“语体”打磨得很光洁，足见当时人们所爱。

“笔”的起来，发展为韩、柳的古文运动。最初的“笔”有些艰涩，经韩、柳的努力，方才规整起来。清代茅坤选唐宋八大家，即以韩、柳为骨干。清的桐城派和《文选》，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此是“笔”发展到一定程度，历经数代，又逐渐僵化。

唐代还有一类文章，文学史不大谈，我认为对后世也有影响，值得一谈。刘知几《史通》是骈散之折衷体，有骈文之规整，而无骈文之堆砌。孙过庭《书谱》讲书法，文体与《史通》一样，有上句必有下句，但又不同于四六文。语言透彻，富于概括力，技巧纯熟。此类文体不纯粹同于骈体，然又有对偶句。唐后期陆贽有《陆宣公奏议》，全为政治论文，文体同《史通》，但句法更灵活，更浅易，亦有上下句的对称。这类文章，应承认它的作用，在明清有影响。明代的八股文就很受它的影响。

此是骈散之间的一种文体，不仅是文学形式的问题。过去一谈形式，便是形式主义，应摆脱这种现象。一种形式的产生，必定有它的道理。

二、古文运动与前后均有关系。唐前期陈子昂、元结等人为文已带有复古的意图。他们为何要复古？有人说是以复古来革新。我认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固然是有意识地以复古来革新，有的却出于不自觉。他们读《尚书》、《左传》，觉得比骈体文好，便事模拟。又北朝苏绰奉旨拟《尚书》作《大诰》，读之令人不解。唐人樊宗师被韩愈吹捧为“惟古于辞必己出”，其实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樊宗师文章的弊病正在于此。他的文章一百卷，于今仅存两篇半。有《樊绍述集》，后人作注，也读不懂。近来出土有其本家樊沔的墓志铭，其文并不艰涩，可以理解。也许这类文章为他所不屑，所以未收入集中。

故复古有真复古者，如苏绰、樊宗师即是真复古。韩、柳不过是摹古，客观上否定了骈体文。韩愈推崇樊宗师，说明他未尝不做此想。不同的是樊宗师是安心不给人看，韩愈却想让人看。有人称他为“谀墓精”（韩愈好作墓志铭），为收稿费，故不敢真复古。这说明韩愈写文章还考虑到读者，所以能读懂。